

## 复杂反而安全

■杨照

戴高乐当法国总统时,曾经半开玩笑认真地抱怨:“谁有办法统治一个可以搞出246种奶酪的国家呢?”

如果戴高乐确定知道法国一共有246种奶酪,老实说,这样一个国家就没什么不能治理的了,戴高乐那句话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凸显国家机器、政府行政与民众生活间的隔阂,国家机器、行政体系掌握不着,更管不到法国人到底制造了哪些奶酪,怎么制造的,又进到了哪些人的肚子里。

法国会有那么多奶酪,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国的奶酪保留了高度手工业特质,小型生产是大宗、主流。再者,法国奶酪绝大部分是以传统方式用生乳制造的。生乳长了细菌进行了种种化学变化,形成奶酪,这是奶酪最基本的原理。想想看,空气里有多少种不同细菌,影响细菌和生乳产生作用的变量有多少,怎么可能算得清楚最后形成的奶酪有多少种呢?

法国人管不住自己的奶酪,看在美国人眼里,简直野蛮。在美国,一讲起细菌,一般人马上联想的就是肺结核和猩红热。

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局(FDA)就严格规定,所有的市场上贩卖的牛奶,都必须经过高温杀菌的程序。

FDA的规定,使得美国人不可能吃到黏黏糊糊、稠稠的牛奶,也排除了像法国、荷兰等地产品的进口机会。于是这么几十年下来,许多美国人以为奶酪就只有那么几种,就只有那些基本、直接的味道。

一直到他们有机会去了欧洲,到巴黎到罗马到阿姆斯特丹,吃到了人家的奶酪。一个吃惯美国奶酪的美国人,在巴黎餐馆留下的赞叹最为经典:“我以前吃的只是奶酪,今天在这里吃到的,是卡拉丝的咏叹调。”

奶酪有其基本的味道,就像卡拉丝唱歌当然还是要照着谱来一样,可是在那基本味道之上,不同地窖不同木桶不同块的奶酪,却会有自己的个性。吃进嘴里时,不同元素依着不同步调从不同角度进攻你的味蕾与嗅觉细

胞,时而狂暴时而轻柔,时而包围时而突袭,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凉爽,在单音当中变幻着无穷可能。

怎么抗拒这种诱惑?更重要的,怎么能在尝过复杂如卡拉丝咏叹调的奶酪之后,回头忍耐干净单纯得乏味的美国奶酪?可以想见,长期以来,美国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地下奶酪管道。有人用不符FDA规定的方式做“另类奶酪”,偷偷卖给餐厅跟美食饕客。1985年,南加州出现一次一共有29人受害的生乳奶酪中毒事件。两件事在当时都构成轰动新闻,让许多美国人“闻生乳色变”。

然而在报道生乳奶酪事件时,新闻媒体都忘了提一件重要事实。那就是从1948年以来,美国曾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奶酪中毒事件,其中只有一次起因于生乳奶酪,另外五次惹祸的是消毒过的牛奶制造的奶酪。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愈来愈讲究自然生机饮食,法式烹调概念被大量引进,终于吸引了科学家们认真去看待奶酪内的细菌作用问题。科学家们暂时卸除社会的偏见,回

到原点,仔细记录不同制造程序产生的菌类效果,长期试验下来,得到了意外的答案。

有愈来愈多的生物学家相信,生乳制造的奶酪,会比消毒牛奶做的,来得安全。关键就在于:生乳形成的是一个多元环境,各种不同菌类在这里复杂互动,彼此影响也彼此牵制。多元而混乱的环境,保证了每一种细菌、每一个元素都在拥挤的自然情况下被中和缓解了。

小小的奶酪,其实就牵涉到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安全”议题。我们要的“安全”,是一个无菌、单纯的环境;还是多元、拥挤、牵制的环境呢?

戴高乐的抱怨,归根究底是抱怨法国社会太多元化了,多元到无法以一套程序、一个原则来治理。

难治理又怎么样呢?难治理的法国才生产得出如卡拉丝咏叹调一般多元丰富、妙不可言的奶酪啊!

(节选自《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杨照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触摸地球素颜之旅

■毕淑敏

关于环球游,我很喜欢“和平号”的一句广告词——这是一趟“触摸地球素颜之旅”。

素颜,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化过妆的地球吧。城市,就是地球浓妆艳抹粉饰过的大痞子,污染的河流,是地球浑浊的汗水,失去绿色的大地,是地球的累累伤痕。让我们看看地球干净的眼眸,让我们摸一下地球苍白的额头,让我们听听地球微弱的心跳吧。

作为一个亚洲人,我们最佳的环球航线,还是从亚洲出发,以亚洲人的眼光来看地球,更为因地制宜。

说实话,在此次航行之前,我很少把“亚洲人”当成自己的一个定位。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但我除了知道自己的肤色和其他亚洲人近似以外,对“亚洲人”这个称谓,没有特别专注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亚洲太大了,太芜杂了。既有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很多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又五花八门,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字眼将它概括。不像北美,想起来就是富裕的代名词,或者是北欧,有很多共同点。亚洲充满了变数,五味杂陈,难以让人有大一统的概括感。

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但是我们至今没有开展远洋客轮环球游的项目。我这人,其实并没有很强的冒险精神。环球旅行,只有搭乘日本游轮,这也是整个亚洲唯一开办这种项目的国家。环球旅行,需要带上眼睛和心灵,当然,还有全身4万8千个触觉神经,和整整一舌头的味蕾。后来,我发现,味蕾还是放在家里为好,带上它,徒增苦恼。

在你的经济情况和身体状态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环球游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去游览一些地方,不要迟疑。有人会想,日子还长,以后再回去也一样!

不!不一样。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收获,那就是——全局大于局部之和。这本来是一个哲学观念,心理学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流派——格式塔学派,也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石的。

当我开始这次旅游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它同哲学和心理学的密切关系。但是当我走完这一圈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旅游对一个人心理和世界观的改变。

如果你在在不同的时间单独地游览一个个国家,我想,也许你会看得更仔细,对一个个的局部了解得更充分。但是,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将世界连成一个圆环,连续地走访不同的国家,飞快地从寒带到热带又到寒带,见识不同的文化和人种,是如何在广袤的地理中渐次演变和晕染,那种震撼和迷惑的感觉,真是心旌摇曳地动山摇。

全局不等于局部的简单相加,全局一定大于整体。

我竭力建议如果有一天你能去环球游,你一定要在这个统一的时间段里,尽可能多走过一些国家和地区。一路走过来,和你整天龟缩在船上,绝不相同。

什么叫环球游呢?有人说,必须要一步不落落地坐在船上,除了最简单的港口一日游,哪里的陆地活动也不参加,这样才有资格说自己像爬一样一寸寸捋过海疆,完完整整踏踏实实实地临摹了地球圆周,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环球游。如果你半路到别处去了,等你回到船上时,已经错过了一段航程,这就是万难弥补的缺口,就没有资格说你是彻头彻尾走过了一圈。将来对着友人夸口的时候,舌头要软一截。

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有。我很尊重这种想法,但我想,环球游,并不是为了破一个纪录或者得到一种证明,它只是我们读解地球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地球上,曾经生活过那么多美轮美奂的生命,他们留下了可歌可泣的遗址,时空在一些角落里凝固,挂满蛛网,蛛网上有一些一触即破的露珠,等待着轻轻地触摸。目光所到之处,露珠簌簌落下,坠在我们的记忆里化作珍宝。

(节选自《蓝色天堂》毕淑敏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智慧之道

■于丹

《论语》里面,自始至终充满着智慧。

智慧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东西,它不见得就是拎出来的一句两句的警句,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真正的智慧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面对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判断力。

我们今天该如何获得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

《论语》总是用最朴素的话去点明那个至高的真理。

樊迟在问老师什么是“知”(智)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两个字,叫做“知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天体物理,懂得生物化学,或许你都不是拥有大智慧,你只是拥有了知识;真正的智慧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面对人心,你拥有什么样的判断力。

在一个充满迷茫的世界里,真正深沉的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面对每一个人以及他背后的历史,能够顺着他心灵上每一条隐秘的纹路走进他内心深处的那些欢喜和忧伤,那些心灵的愿望。

学生再问老师,知人以后要做什么呢?看来樊迟还是不能理解老师的意思。

老师又说:“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就是这样十个字,说明我们知人以后要干什么。“举直”,是把那些正直的、有才能的、善良的、符合社会核心价值的人,提拔上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空间。“措”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位置上。放在哪儿呢?放在“枉”者的

上面。“枉”就是那些不正直的、不那么高尚的人。

也就是说,让贤达的、善良的人,让这些符合核心价值的人,在那些不怎么善良的、有一己之私的人之上。这是一个标准。

“能使枉者直”,这个标准更温暖。也就是说,人性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我们不能说某一个人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大善人,也不能说某一个人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毒小人。人性中的各种元素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中,或善或恶,在一定的环境作用下都会有所释放。

什么叫做“能使枉者直”呢?就是说,一个人也许表现出来的不是那么高尚,也许他在做法上有一些促狭,甚至有一些卑鄙,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你了解人心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力量,让一个不那么高尚的人,也就是心思可能有很多弯弯绕绕的人,让他起码在跟你合作的这一段时间里表现得正直坦荡一点?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叫“能使枉者直”。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人生的真正成功不在于你凭运气抓了一手好牌,而在于你抓了一手坏牌,但是你能把它打好。人生交往的真正成功不在于你侥幸一路走来遇到的全是君子,而在于你遇到有些不能成为君子的人,当然不一定就是小人,能不能因为从跟你的交往中看到人性中的温暖、善良,看到你对他的体谅、包容,而让他美好的一面更多地表现出来。为什么要知人呢?孔子说,就是这样一目的。

(节选自《于丹〈论语〉感悟》于丹著 中华书局)

## 听心跳放下静如蝉

■林夕

风景不转心境转

1082年,苏东坡途中遇雨,没带雨具,常人只有狼狈二字,雨声打在竹林上发出巨响,不是不寒心的。好一个苏轼,就这样写下宋词中我的最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不用不听,而用莫听。

不听,那种坚决,就要运用意志力,跟雨声抗衡,莫听,是你可以选择听,但声音也只是外物,你的心可以决定听不到,听不到,着一“莫”字,境界就从容自主起来。

何妨吟啸,那何妨也是一派优雅,反正落汤鸡的现实无法改变,倒不如吟其当时的流行曲。无法改变的事情,就让它自然存在吧。

苏老当时只拿这竹拐杖,穿《倩女幽魂》内那种草鞋,从头到脚尽湿,没有坐马,只是一步一生。但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从负面自嘲发掘出乐趣,雨中持杖穿轻便草鞋,比骑马还轻便。

雨停了,金句来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境界较低的是,好了,雨停了,身干了,雨后自有晴天,做人无须在逆境中头发乱了。

苏东坡却更通透无障碍,雨可以不是雨,逆境中凭心境自乐,于是,晴也不是晴天,万法无常之变与他心境无关。

我常常想,万一有时运低见鬼,也会学苏老,心里无鬼,于是,看不见,看不见,然后转身走开,吟啸:“也无风雨也无晴。”

心如画师

请想象一个画家,他拥有自由的意志去画什么。齐白石爱画虾,可以想象他的思想慢慢会在一个虾的世界里。一个画家的心境会影响他的题材笔触用色,从画作可看出画家的心灵状态,如患上躁郁症的凡·高,他在低落时写的画,色调偏向沉郁,但,最伟大之处在于,在贫病失恋被出卖的绝境下,他依然有很多色彩亮丽的作品予人以生命力的精神境界。他一些夸张的勾勒用色,是因为精神病发还是艺术手法



“因为我不能够了解你们为什么坐在一张圆桌上,没有人规定说吃多少菜,而大家都知道吃多少菜。”

## 如何界分权利与义务

■蒋勋

在中国旧有的社会,道德是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对于家族也有一个相依赖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要鼓励西方的伦理,把个人独立出来,不要对家族负责,就需要社会的法律、公民的道德、公民的意识来做约束,这个部分是我们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办法替代原有的东西,只好又沿用旧有的,就变成不新不旧。

譬如很多人会说西方的个人主义会让人变得自私,这就是错误的,他是自信跟自立,不是自私。自私是相对于中国旧的家庭伦理。小时候我们家八个人吃饭,那端出来的一盘菜,没有人规定一个人吃多少,可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稍微多吃一点,妈妈眼睛就会看我,如果我还没有分寸,妈妈就会讲:爸爸还没有回来哩。就是吃饭的动作也要意识到群体,多吃了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如果是另外一种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对于每一个人的界分已经是做好的,就像吃自助餐,你的食物就在你的盘子里,就没有自私的问题了。

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女作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学,她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吗?因为我不能够了解你们为什么坐在一张圆桌上,没有人规定说吃多少菜,而大家都知道吃多少菜。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好荒谬,这不是很简单吗?她说,对她而言很难,因为在西方社会里,

如果不把食物分好,就不知道应该要吃多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原有的东西是有一个道德公式,逾越了公式就叫做自私,可是今天转换成现代公民的时候,不应该存在自私的问题,因为法律跟道德原来就把每个人的权利、义务都界分好了。

如果法律跟道德没有界分,又没有旧社会的群体制衡,就会像动物一样,大家一起抢,抢赢的就是最强的人、最霸道的人,再由他来分配。

我想,台湾会慢慢建立出一种新的结构,不会完全是传统的,也不会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会有正直的法律,会有合理的公民道德,可是什么时候能建立?我不晓得。

但我知道,法的公正性是一定要先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立法”跟“司法”这两部分,目前都是被污染的,沾带了太多原有的家族的堕落性,是让人非常忧心的问题。

当然光靠法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文化、道德、宗教等其他东西来辅助,我说法是当务之急,是因为法若不公正,其他辅助力量就会变成混水摸鱼,甚至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法。

时代快速进步,伦理不断改变,人要在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下自处,应该是找回自己的信仰,在对人、对事的期待与渴望中,重新去体验、追求本身代表的那种高贵性,才是永恒不变的。

(节选自《生活十讲》蒋勋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娱乐业时代

■[美]尼尔·波兹曼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

地电视机上可以放30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21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问,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

“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我们可以想象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象一下,16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上帝德的话来谈,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15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做是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节选自《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